

六年準備八年抗戰

滕 傑

對戰爭演變推論正確

抗日戰爭計劃，在近代中國各種戰爭中，是一項最優越的計劃。這一項優越計劃是在先總統蔣公介石親自主持下完成的。這一計劃不僅對敵我形勢及敵人計劃估計的正確，尤其表現於對戰爭演變推論的正確。前一項估計是屬靜態的，後一項估計則屬動態的。對靜態的估計比較容易，對動態的估計很難。對很難的估計中國能做到沒有錯誤的地步，而日本則不能。日本對中國內部可能發生的有利變化，完全沒有估計到，它在「廟堂之上」就被中國打败了。

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長期承受中國文化薰陶，它的文化基礎，應是一個擁有王道文化的國家。雖在三百年前，曾出現抱持侵略主義的豐臣秀吉，但並不代表日本文化本質的變化。真正使日本文化本質上起變化的乃是明治天皇所領導的明治維新。明治維新使日本樹立了一個穩定的領導中心，國家得到真正的統一，於是它便集中國力，有計劃的建設現代化的國家。它一面派遣學生至歐美各國留學，吸取政治、經濟、軍事、教

育文化知識和技術，同時又聘請各國專家顧問到國內做各方面改造的設計與指導。如此，有計劃的做法，效率很高，發展很快，在短短二十年中，即進入現代化國家之林。在此過程中，西方功利主義文化，（也就是弱肉強食的霸道文化），隨着科學的知識和技術一併來到日本，其勢之盛，銳不可當，從此使日本這個國家不再有王道。

日寇狂妄要征服世界

日本明治維新後，決定採取南進政策、大陸政策，實行侵略以征服中國為其不變的目標。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田中義一奏摺出現，日本不僅要征服中國，還要征服世界，其狂妄已達極點。由明治維新到九一八事變五十多年中，日本不斷進行侵略，不斷蓄積力量，九一八事變時，它已成為僅次於英、美的世界強國，完成了征服中國所必需的充足準備。此時的日本軍部特別是關東軍中少壯派，他們瘋狂的侵略野心，已非日本內閣所能控制。日本內閣被軍部牽着鼻子走，爆發了九一八事變，闖下滔天大禍。

軍部左右日本政府，使它成爲軍國主義國家

，實質上，自從明治八年侵略朝鮮，即已走上軍國主義之路，這從日本不斷的模仿德國動員制度及其軍國民教育，便可清楚的看出。其軍人在這種思想與制度中，自然形成了舉足輕重的地位，日本憲政政府變成法西斯的政府。在此情形下，日本便很難出現有遠見的政治家，即使有濱口雄幸、若槻禮次郎、幣原喜重郎等人，主張中日共存，也無力發生實質的作用。

控制日本政局的狂妄軍人，對於當時中國的積弱以及四分五裂的現狀，瞭解得十分清楚。他們斷定以高度的工業水準，現代化的三軍，舉國一致的戰鬥精神，對中國實行全面進攻，三個月內便可征服中國。這種估計本是正確的。可是他們却未估計到進攻前的短暫時間內，中國內部發生的適應戰爭需要的變化。這一個預估的失算，決定了日本必敗的命運。

在中國，情形完全相反，中國既瞭解中日雙方的優點和弱點，更能正確估計戰爭爆發後發生的變化。

對敵我短長的瞭解原是極簡單的事，因爲敵我短長都非常顯明。日本的長處，是高度的工業

水準，現代化的三軍，長期的戰爭準備。短處是資源缺乏，一切工業與軍需品的原料都要仰賴外國的供應。其次是它獨吞中國的計劃，與四十多個在中國有利害關係的國家。特別是其中幾個強國，有根本不能容忍的衝突。這兩個弱點，戰爭一持久，必然爆發出來，日本爲求其弱點不爆發，優點能有效的發揮，必要採取速決戰略。

抗戰計劃針對日本陰謀

基於這種瞭解，來對比中國的情況，要不能善用我們所具備的天然優越條件，日本確有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可能。因爲中國當時還是一個古老的、衰敗的農業國家，農業人口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人民缺少教育，國家民族的意識淡薄，過着散漫生活，不能團結合作。工業生產談不上，三軍裝備落後，農村經濟破產。軍閥與共產黨的割據憂患重重。但是中國有「地大」與「人衆」條件，是日本所不及的，把這兩個條件運用起來，充分發揮優越作用，補救我們的弱點，對銷敵人的優點，暴露敵人的弱點，便可取得最後的勝利。

這情形很多人都能看得清楚，但沒有人提出運用這「地大」「人衆」的計劃來。當時，數十位留日留俄的以及在國內服務的黃埔同學，在先總統蔣公領導下，針對敵人的陰謀詭計，完成了抗日戰爭的全部計劃。

抗日戰爭的計劃十分優越，是日本人、共產黨所想像不到的，一些割據的軍人更不可能想像得到的，抗戰計劃之擬訂是由「實行計劃」到「

準備計劃」，計劃之實施則由「準備計劃」到「實行計劃」。

發揮地大人衆總力量

自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到二十六年七七事變，這六年，是中國抗日戰爭的準備階段。由七七事變到三十四年八月日本投降，是抗日戰爭的實行過程。先準備後實行，所以抗日戰爭的全過程是十四年，不是八年。世人研究抗日戰史只注意八年實戰經過，未研究六年的備戰歲月，是不能瞭解其真象的。

七七事變前夕，中央已完成了全面抗戰的必要準備，因此抗戰開始便能動員國家總力，運用廣大空間，對敵進行有效的作戰。

日本在其速戰速決的方針下，原定的作戰計劃，是用海軍封鎖中國海岸線，阻絕我對外關係，斷絕外來接濟，使中國陷於孤立無援之境。用空軍配合陸海軍作戰，摧毀中國軍需民用的生產機構，使戰力消耗之後，無法補充。陸軍則集中其主力於我北方若干省，沿平漢、粵漢鐵路向南進攻，將整個版圖，由當中劈成兩半，在各個擊破原則下，分別殲滅我之軍事主力。

同時，用「以華制華」策略，在各地劃分範圍，建立漢奸政府，作壓搾民衆的傀儡，使我中國名存實亡。日本估計，祇需三個月時間即可擊敗中國，然而，他們估計錯了，事實的演變，剛相反。

戰爭開始之前，在蔣介石領導之下所建立的黨政軍總力組織業已完成，已能發揮「地大」

、「人衆」兩優越條件的作用，對敵一切策略的運用都能產生預期的效果。這與九一八事變時的情況迥然不同，這種重大變化，在短短的六年之內形成，實爲敵人所料想不到的，因此，日本既定的計劃遂從基本上失去其實踐的可能性。

拖住敵人由東向西走

七七事變發生，國軍在蘆溝橋作了堅強的抵抗。八一三淞滬戰起，每天都要增援一師到兩師的兵力，總計在十週作戰中，傷亡十八萬人之多。以此重大的傷亡代價，迫使敵人主力進入東南，誘敵由東向西，打破日本由北向南的計劃。這不但改變了它的方向，也分散了它的力量，以後日本一直被國軍吸引控制，失去主動。

由東向西，是日本最不利的攻擊方向，因爲中國西南爲山陵湖沼地帶，日本裝甲部隊在此地帶作戰，運動受到很大的限制，反之，則有利於我輕裝備部隊的運動，在地形運用上變成了敵消我長。

日本由於兵員人數有限，先後僅動員了三三萬人，來到中國戰場，這在中國的大國土上，祇能佔領一些重要的點線，無法佔領廣大的空間。中國藉由廣大的空間，機動運用各種力量以控制日本所佔的點線，使在力量部署上反劣爲優。

這一運用廣大空間，削弱敵人的做法，更加上運用持久的時間，消耗敵人。使它資源枯竭。敵人資源枯竭之日，便是中國抗戰勝利之時，這是當時「以空間換取時間」的又一項成功的策略。

用游擊戰法消耗敵人

爲着牽制敵人、消耗敵人，中國組織了很多的游擊部隊，運用游擊戰法，擾亂敵人、消耗敵人。對敵實施反封鎖，不許一切物資流入敵區，使其失去就地謀求供應的機會，增加補給的困難。

針對日本國內資源缺乏的弱點，中國政府不斷從外交上促使其在國際間陷於孤立，減少或斷絕其資源供應的來源。中國運用持久消耗戰略的結果，逼得它爲急於獲得資源供應，不得不向南洋各地去侵略，與英法各國發生衝突。最後偷襲珍珠港，直接與美國爲敵，日本在國際間完全孤立了。它的德義軸心伙伴，自顧不暇，日本對戰爭消耗更加增大，竭澤而漁的在海外的掠奪，不能長久維持其國內的需要。加之美國大規模轟炸日本本土，生產設備遭受重大破壞，各種生產工廠陷於萎縮，有的停工，有的被破壞。

日本在中國戰場上無數次的大小戰團，重要會戰，損失非常重大。特別是八一三淞滬會戰、臺兒莊之戰。武漢會戰、棗宜會戰、長沙會戰、長衡會戰，都嚴重消耗了日本的戰力。不僅大量消耗了它的物資，更深深的打斷了它銳氣。其在南洋戰場也得不償失，在太平洋戰場的消耗，更屬驚人，其島嶼爭奪由全勝而全敗，陸軍就殲，海空軍被殲，最後，美國即使不在廣島長崎投擲原子彈，日本也無法繼續作戰，終歸要向盟國投降。這在基本上還是中國持久消耗戰略所收效果。

敗於廟堂日寇投降

日本對持久消耗戰略，本有非常狠毒的對策「以華制華」；它先後成立了七個漢奸政府，企圖用做控制中國人民的代理人，爲日本解決人力物力的供應問題，並打破舉國一致的團結抗日活動。七個漢奸政府是：二十一年三月九日在長春成立的「滿洲國」，二十二年十月在百靈廟成立的「內蒙古自治政府」，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河北通縣成立的「冀東防共委員會」，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北平成立的「臨時政府」，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在南京成立的「維新政府」，二十八年九月十四日成立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運用汪精衛在南京成立的「國民政府」。可是在我國同仇敵愾民族精神業已養成的情形下，這些漢奸政府，無一能發生日本人所希望的實質作用，甚至他們所建立的漢奸部隊，暗中還向國軍通聲氣，配合國軍的作戰行動，使日本人枉費心機。

日本內外交困，走投無路，於三十四年八月十日宣佈無條件向我盟國投降。它是敗於「廟堂之上」。至此，中國抗日戰爭計劃完全實現，獲得如所預期的全面勝利。

六年準備秘密大行動

中國八年抗戰終獲勝利，根本原因在能發揮「地廣」「人衆」兩條件的優勢作用；這優勢作用的發揮在於六年抗日準備工作獲得預期的成功。

六年準備工作，是在極端秘密情況下進行的。到了今天，有關這一秘密的資料，尚未全部公開，外間所得而聞者，只是一鱗半爪的片斷史實而已。因而研究抗戰歷史者，無法窺其實質的全貌。

抗戰的六年準備工作，是領袖蔣公以秘密的三民主義力行社的組織爲骨幹，運用公開的黨政軍民各種可用的組織來進行的。力行社是全部準備工作之實質的核心組織。要瞭解抗日準備工作，必須先瞭解三民主義力行社。

三民主義力行社的最高目標在徹底實現三民主義，但其階段目標則在執行安內攘外政策。力行社是於民國二十一年三月一日，由領袖蔣公親自主持下，在南京勵志社成立的。其籌備工作開始於二十年「九一八」事變前夕。在六個多月的籌備期中，完成組織工作各種計劃草案，以及預定由中央到各省市之負責人選。參加籌備工作的同志。總計四十餘人。筆者被推爲籌備處書記，陳啓坤爲助理書記，康澤爲常務幹事，曾擴情、賀衷寒、潘佑強、杜心如、鄧文儀、桂永清、鄧梯、鄭介民、胡宗南、葛武榮、張鎮、孫常鈞、蕭贊育、葉維、蔡勁軍、婁紹鑑、李秉中、黃仲翔、田載龍、韓文煥、千國勳、彭孟緝、趙龜生、侯志明、張本清等爲籌備處幹事，其中一部份人因公不在南京，經常參加籌備工作者，實際只有二十多人。

力行社的成立經過，十多年來已有千國勳、鄧元忠等爲文敘述，在此不再重複。力行社的成功，首先表現於其自身組織之建立與發展的計劃

，此種計劃效率之高，非但超越了所有軍閥集團，也為共黨所望塵莫及。力行社的組織建立後，兩年之內即對全國作重點性的控制，在六年之內（由九一八事變到七七抗戰）即能達到預定的「安內」目標。

力行社是民主戰鬥體

力行社是怎樣組織？怎樣發展的呢？當時世界上有三種性質不同的政黨組織：一是英美的和平民主的政黨組織；一是蘇俄的極權戰鬥的共黨組織；一是義德的極權戰鬥法西斯黨組織。這三種組織各代表其不同的經濟背景，民主政黨以資產階級為背景，共產黨以無產階級為背景，法西斯黨以中小資產階級為背景。為打倒資本主義而有共產黨，為打倒共產主義而有法西斯黨。後來者居上，一個強過一個，共產黨打敗了資本主義政黨，法西斯黨又打敗了共產黨；這是當時的情形。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該走那一條路呢？在這三條路中無可選擇，三條路都不是應走的路。我們所應該走的路，是自己的三民主義全民民主之路。但不管什麼性質的黨，其實踐的經驗都是值得參考的。和平民主乃是人類理性必然的選擇，理想的和平民主目標必將為人類永遠不變的追求目標。不過，西方各國所行的資本主義的階級民主，乃是產業革命自然形成的初步民主，不是成熟的民主，不能成為人類理想的民主。能夠成為人類理想的民主的，只有三民主義的全民主：此乃我們深信不疑的瞭解。但集權體制，却又是戰鬥必要的條件，軍隊之所以能戰鬥，就在於它的組

織具備了集權的條件。自從列寧發動十月革命以來，民主世界面對共產黨集權戰鬥體制高效率的威脅，一直是束手無策的，其能給予共產黨以有效之反擊者，只有採取同樣集權體制的義德法西斯黨，於是法西斯黨成為當時人們消滅共黨禍害之希望所寄。可是法西斯黨是用共產黨的暴力手段以對付共產黨的，它的本身也是一種殘酷的暴力集團，它之能夠戰勝共產黨，祇不過是禍亂相循，以暴易暴而已，豈足為訓？

這情形告訴我們：能戰鬥而不能民主，不能切合人類久遠的理想要求，能民主而不能戰鬥，則不能適應當前的戰爭需要。既要適應當前的戰爭需要，又要切合久遠的理想要求，除了採取和平與戰爭結合，民主與集權結合的途徑外，沒有別的路徑可循，這種結合的結果，就構成了民主的戰鬥體了。

因此，力行社的組織就是民主戰鬥體的組織。民主戰鬥體的組織，在歷史上是不曾有過的，因為民主制度原是根據和平的假想而設計出來的。力行社之民主戰鬥體的組織，是一種創造性的設計。這種設計從表面看來完全與國民黨一樣，它也是一種民主集權的組織，但在實際上則大不相同，其不相同之點，在它對民主集權原則的應用。

力行社把民主與集權分開來應用，它把民主限於討論與選舉，集權則限於對決策之執行。因為討論與選舉是民主的，所以討論所獲致的結論，便能真正代表多數人的意見，選舉所產生的執

行者，便能真正為多數人所尊重。為使民主的結論能夠獲致徹底的實行，應賦予為大家所尊重的執行者以集權的執行權力，這是很合理而自然的事。如此執行的集權，不僅無害於民主的原則，相反的，它正是民主主張獲得貫徹的保證。執行者一經有了集權的執行權力，則其對組織之運用，即有可能做到如臂之使指的靈活，針對各種情況，因應自如。能夠運用靈活，因應自如的組織，便是戰鬥體的組織。這種戰鬥體的組織是以民主為其本質的，所以它就是民主戰鬥體的組織。這就是力行社應用民主集權原則以建立民主戰鬥體的方法。

國民黨當時對於民主集權原則的應用，沒有明確的規定，在行動上並沒有指導原則，所以，民主集權對國民黨來說，它並沒有發揮其應有的約束作用。其所以如此的原因不一，但由此而產生的後果，使同志們直接感受到的。就覺得黨已成為既不民主又不集權的黨了。因而形成了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一種無奈景象。這景象，在力行社中是絕對沒有的，這就是力行社與國民黨重大的不同之所在。因為有此重大的不同，便產生了構成份子，組織路線，組織形式，以及紀律、訓練、領導，與革命精神之各方面的不同，力行社從這各方面的不同中形成其為一個空前的高效率的民主戰鬥組織。

這些不同都是由對組織原則之不同的應用而產生的，但在主義與政策上力行社則是與國民黨是完全相同的。其不同者屬於組織方法，相同者屬於組織本質。由於在本質上是相同的，遂使兩

者在實際上有了不可分的關係。又由於兩者的領袖同為蔣公一人，更決定了實際上之不可分的關係。因此，在形式上，力行社與國民黨雖為兩個各自分立的組織，但在實際上，經由領袖的領導與運用，向着同一目標前進，便成爲一個革命組織之一體的兩面了。國民黨爲公開的一面，力行社爲秘密的一面，領袖以這公開與秘密配合的領導方式，完成抗日的準備計劃。公開與秘密配合的領導方式爲一種最有效的領導方式，如不採取這種領導方式，則在當時的複雜情形下，是不可能順利完成準備的。

抗日準備計劃內容是「先安內後攘外」。在「安內」工作中包含國家統一與國家改造兩部份。在國家統一工作中，又包含瓦解軍閥割據，消滅共黨叛亂兩個部份。在國家改造工作中，包含發動全國規模的四大運動。必須這些工作一一完成，攘外工作，才會有所憑藉的。而力行社的組織也就是伴隨着這些工作的發展而發展的。

國家能否統一爲能否對日抗戰的前提，此爲人人皆知的事。但自民國以來，國家就一直不曾統一過，袁世凱用武力未能使國家統一；吳佩孚用武力亦未能使國家統一，國民革命軍十五年北伐，採取以武力爲主，政治爲輔的原則，也祇能求得一時的表面統一，可見統一問題解決之不易。我們迫於危急的情勢，必須要變不可能爲可能，否則，就要亡國。我們不僅要求得統一，更要求得真正的統一，尤其非在短期之內求得真正的統一不爲功。所幸，從歷史經驗中找到了啓示：「純武力戰」固不能解決問題，「以武力爲主政

治爲輔」亦不能解決問題，只有改採「以政治爲主軍事爲輔」的作戰原則，才能爲統一大業的前途帶來希望。

葉簡修的大無畏精神

在統一工作中，瓦解軍閥割據，比消滅共黨叛亂容易得多。軍閥集團主要都是基於各位權利的關係而結合起來的，他們既無主義信仰，也沒有羣衆可爲依靠，只要針對其名位權利慾望來進行瓦解的設計，運用當時所具備的比較優越的條件，便不難達到瓦解他們的目的。當時的戰略重點計劃是：「連絡西南，瓦解兩廣，穩定山東，安撫華北」。在動員各種關係，使用各種方法，採取不停的積極的攻勢主義情況下，計劃中的每一個重點，都在六年之中如所預期的實現了。就中意外的發生了閩變，對閩變的平定，曾動員過局部武力，此外都是政治作戰所收的功効。平定閩變，瓦解廣東，具有鎮懾全局的作用。瓦解廣東之役至廣東空軍反正來歸，即告結束。這當中力行社戴笠、謝瀛洲、鄭介民諸同志之悉心策劃，週密部署，果決行動，厥功至偉。而首任廣東分社書記葉簡修及其若干助理同志，因意外失密，不幸爲陳濟棠所捕獲，俱遭毒手。他們堅強不屈壯烈成仁之大無畏精神，未讓先賢先烈。忠貞日月，氣吞山河，爲力行社歷史寫下光輝的一頁。此外，以康澤爲首的西南青年社（力行社中之特設組織），以秦啓榮爲首的山東分社，先後以賈毅、劉廣瑛爲首的北平分社，也都有效的執行他們所分擔的統一任務。由於日本人對華北五

省之蠶食日益積極，爲強化對華北情勢之掌握，劉健羣同志並曾親率宣傳總隊進駐北平，以爲分社組織之助。

在實行瓦解軍閥工作之同時，又實行了剿共工作。剿共工作比較困難，因爲中共有組織、有主義、又有羣衆。還有蘇俄運用第三國際組織，直接間接多方面大力撐持，凡此條件均爲軍閥集團所不具備的，連日本人也不能與之比擬，實爲統一工作中之最堅強的敵人。

國軍曾四次以大軍進行圍剿，均歸失敗。到了最後一次——第五次，所採「以政治爲主軍事爲輔」的作戰原則，即改採領袖所提示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作戰原則，進行圍剿，才大告成功。爲執行這一新的作戰原則，進行了一年多的部署，其重點即在從共黨手中把戰區的羣衆奪回來。這一奪回羣衆的工作，牽涉到政治、經濟、文教、軍事各方面的建設，特別是各方面的基層建設。在政治方面強化了保甲的編組，實行連保連坐制度。在經濟方面，創設了專業的農民銀行，在農村普設互助合作社，以促進農村經濟活力之恢復。在文教方面，除普遍進行三民主義之思想宣傳教育，以清洗共產思想之毒素外，又發起新生活運動，從日常生活各方面促進人民生活之現代化。在軍事方面，劃分管區，革新編制，加強在羣衆基礎之上進行作戰的思想與技術的訓練。爲適應這種部署徹底成功的需要，在武昌和星子特設三種性質不同的訓練班。在武昌設豫鄂皖三省保安團幹部訓練班，訓練三省保安幹部，由蔣伏生主其事。設豫鄂皖贛四省農村合作訓

練所，訓練四省的農村合作幹部，由文羣主其事。筆者曾一度奉命去武昌負起這兩個班的政治訓育責任。在星子所設的訓練班，初為暑期調訓軍中政工人員的班次，由賀衷寒主辦，筆者曾一度前去擔負過政治訓育的責任。後改為常設的以組訓戰地民衆為主的幹部訓練班，由康澤主辦其事。以後康澤所率領之別動總隊，即是以該班畢業之學員為基幹而組成者。凡此訓練都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因而奪回戰區的羣衆，使所實施的各種性質各種形式的作戰都能在羣衆基礎之上來進行的計劃，都能如所預期的實現。在此情形下，軍事作戰便成為總體戰中的軍事戰，絕不同於過去的單純軍事戰，這正好把過去敵我的優劣形勢反轉過來，於是敵人無計可施了。對贛南匪巢，以大軍緊緊予以包圍，並實施碉堡政策，斷絕其內外連繫，嚴密經濟封鎖，然後不斷的緊縮包圍圈，敵人終於走到盡頭了。最後，朱毛只得利用黑夜，率領其殘餘武裝突圍，作二萬五千里之狼狽的長途逃竄。逃到延安後，殘餘武裝不過兩萬多人，再加一擊，即可全滅。遺憾的是，西安事變，遺下禍根！但我們的國家，還是因為江西第五次剿共最後一戰得到了統一。

四大運動達成目標

事實證明「政治為主軍事為輔」乃是謀求國家統一之最有效的戰法，祇是以後就再也沒有使用過這種戰法。八年抗戰，三年戡亂又都恢復了過去「以軍事為主政治為輔」的戰法，抗日勝利了，戡亂却失敗了，由此可知以武力為主的戰爭

，可以有有效的用之於對外，却不能用之於對內，尤其不能有效的用之於對付共產黨。這即是來臺之後，領袖蔣公再度強調今後必須以「三分軍事七分政治」進行作戰，並且增加了「三分敵前，七分敵後」兩句話，以為今後反攻作戰之指導原則。今後反攻復國的戰爭，仍須根據抗日準備時期成功的經驗，恢復「以政治為主，軍事為輔」的戰法，才有成功的希望。抗日準備的另一部份工作，就是對國家的改造。中國是一個古老的農業國家，人民養成了「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的習性。雖則，百餘年來，飽受帝國主義者侵略剝削的刺激，然而這種習性

，並未因之而有重大的改變，愚、弱、頹、散，依然如故，既無尚武精神，亦缺乏國家觀念，如不加以必要的改造，即或國家統一了，也不足以對抗日本強敵。所以，力行社決定把國家的改造工作與統一工作，互為配合，同時並舉。因而先後發起國民軍訓運動、新生活運動、勞動服務運動與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國家統一計劃，是在極端秘密原則下付諸實施的。但四大運動自計劃與實施都是公開的。都在六年之內達到了預期的改造目標，文獻俱在，可供參考，不再多贅。因排印時間匆迫，本文未能送請滕傑先生最後核校，如有錯誤容再更正。（編者）

中外文庫之二 袁世凱傳

增訂再版

章君穀著 全一冊台幣一五〇元

袁世凱於光緒八年到朝鮮迭次平定大亂，獲得韓王李熙的信任，把持朝政，儼然監國，使中國在朝鮮的宗主權，不然為之一振。袁世凱朝鮮十二年間是他一生事功最顯赫的時期，同時也是他飛黃騰達，青雲直上的初階。這一段史實，波譎詭秘，瞬息萬變。然而若干年來，却無完整而信實的記載。現經名作家章君穀搜集史料，以生花妙筆寫袁世凱一生中最高光的一段時光，全書廿餘萬言附林光灝著「袁世凱和汪精衛」共四百餘頁，另有珍貴插圖，歷史鏡頭，全一冊合售一五〇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